

## 原始与现代:上海的双重面貌 ——20世纪早期中西作家对上海的不同想象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36)

**摘要:** 在中国作家的意识中,上海是最西化、最现代的城市,但在西方作家的想象中,上海仍是东方情调的、原始、野蛮、未开化的城市。但不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作家,都把上海表现为混乱无序、自由放纵的道德荒野,而这一特性又与想象中的“异国”密切相关,并与中西正统文化的异质性融为一体,成为中西作家认识上海的支配性因素。

**关键词:** 上海; 都市化; 异国情调; 空间意识

**Abstract:** Many Chinese writers hold Shanghai as the most modern westernized city in China, while in the imagination of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Shanghai is still oriental, barbarous and uncivilized. Though a large difference there is, yet one point in common shared by those writers, both home and abroad, is that Shanghai is a chaotic and unrestrained wilderness of moral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agined image of an alien land an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heterogeneity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is unique feature of Shanghai has become a dominant factor shaping the perception of writers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Key words:** Shanghai; urbanization; exotic flavor; spatial consciousness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101(2005)01-0104-12

19世纪后期以来,上海作为一个特殊城市,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超过了中国的任何城市,成为文学的中心城市。作为中国城市化、现代化的实验地和最集中的体现者,上海也是最能激发作家想象、最具吸引

力、最成问题并最令人焦虑和困惑的城市。在中国人的眼里,上海是最西化、最具异国情调、最现代化的城市,但也是道德的荒野,它体现了中国正统道德的反面,从丧失主权、领土分割到商业主义、欲望放纵等等,无不体现了对传统价值的破坏与对抗,而这一切又都与外国相关,因此,对上海的形象也与对异国的想象密不可分。同样,在西方人眼里,上海也典型地体现了“异”的本质,这种“异”不仅体现在它接受了西方正统文化的反面价值,容纳了西方道德、秩序、法规戒律、宗教信仰所禁止的那些方面,它几乎被看作是“异教的”罪恶之城,但也充满着可以打破禁忌、自由放纵、回归原始的期待,因此,它是危险的性爱所在,是自由主义的、充满了机遇的城市。在西方人的想象中,上海,作为一个中国城市,其“中国特色”典型地体现了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于东方异域的形象,即代表着与发达的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相对立的农业文明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负面价值,如政治腐败、科技落后、原始、野蛮、未开化等等。

关于中国文学中上海的现代性特征已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并予以深入细致的论述,<sup>①</sup>本文毋庸赘述,但需要指出的是,上海的种种现代性特征不仅通过故事的叙述而且更主要的是通过空间的剪裁与场景的戏剧化得以体现。晚清以来在关于上海的各类文本——小说、散文、电影、历史表述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经久不衰的空间意识,这种空间意识不同于相似时期西方都市文学中对都市空间生态环境的关注及对于工业文明的批判,中国上海文学中的都市空间意识与上海本身的殖民地城市性质密切相关,主要体现为对于空间分割、差异空间的对立与并存以及跨越边界的强烈体验。租界是西方与上海本土争夺空间的战利品,是膨胀为殖民主义的西方民族主义和中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相互碰撞的结果。<sup>②</sup>它的存在把上海空间分割成风格各异区域,使之成为一个跨国空间,它以最直接的方式将过去遥远的边疆、国土、主权问题拉入普通人可触摸的范围,并纳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原先完整的、自成一体的空间被瓜分、切割,游走上海仿佛是跨越领土国界,处身本

土空间仿佛置身异国,因此,租界成了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一个情结,在文学中,租界也成为最能激起作家矛盾情感和引发无数联想的地方。对这一分割空间的描写一方面表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疆域、国土意识,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中西城市规划、建筑风格并存、冲突所造成的家园的异化感、个人对生存环境的陌生感,这成为吸引文学家不断进入该城市那些已然或正在发生着巨变的奇异地方观察、探索的动力,并在文学中不断重复描写这种异己陌生的空间对于主人公的心理影响。在这种不断重复的话语建构中,上海的空间被裁剪、复制成为以租界为中心的特殊他异空间,十里洋场代替了整个上海,成为上海精神的象征。地图化的语汇充斥于小说中,作家自觉不自觉地沉湎于一种象征性地绘制上海地图的行为中,详细描画人物的行踪线路图以及沿途那些特别的建筑物、节点、景观、拐角、越界等等,文本中所描绘的游走路线构成了一幅文字地图,读者熟知的、真实的大街——南京路、四马路、霞飞路等等以及沿街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电影院、大戏院、跑马场、豪华饭店、银行以及大街上的摩登女人、洋人、汽车等等,这些异质性元素成为标志上海身份不可或缺的东西,通过这些“材料”形成了一个异国情调的、现代化的,但也是色情化的、道德堕落的城市形象。“游走”也成为小说结构和表现人物的重要因素:根据一个人的线路图和他的停靠地表现人物,某些地方总是与某些行为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这些地点暗示人物的道德倾向和生活方式。而作家对这些地方也表现出明确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意味。正是在这种作家、人物与其所处空间的融会、交流中,作家的态度、人物的形象和上海的特性被展现出来,空间也被赋予一种明确的政治、道德意义,因而被政治化、伦理化。

且不论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那些以表现上海西洋风为主调的新感觉派作家,即使是那些公认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对上海空间的描述中,也自觉不自觉地以十里洋场为主体场景。如茅盾在20世纪20、30年代所写的散文中,公园、舞厅、电影院、交易所、火车站、大街和大街上的摩登女人、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等都曾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他谈论

过,他对西式娱乐活动以及场所表现出明显的拒斥态度。在《秋的公园》一文中,茅盾把这个现代化的西方公共空间描述为“都市式高速度恋爱的旧战场”,短裳朋友被拒绝入内,游园常客除了外国妇孺,便是中国的摩登男女,公园是他们的恋爱课堂之一。<sup>③</sup>茅盾对于空间利用中的不平等表示不满,同时又把它的休闲功能与青年的颓废联系起来。在《上海大年夜》中,一方面通过南京路一半商店的倒闭破产表现上海经济的萧条,另一方面则通过霓虹灯、汽车、高大的建筑、川流不息的人群构成的大街风景和各处电影院、大戏院密密层层的人群表现“疯狂的享乐和放纵”的上海图景。在茅盾以上海为中心的作品中,上海的空间也以租界为中心,租界范围内的街道、建筑、娱乐场所,常常比其他地方花费更多笔墨渲染,他不厌其烦地交代人物的行走线路图,他们所走过的街道、停留过的咖啡馆、饭店、大厦,甚至包括他们驻足的街角、车站、码头,详细地记下他们看到的风景、遇到的人。而租界之外的地方,则常常被一笔带过,它们是无名的、模糊的、无标志性的,似乎也激不起他详细描写的兴趣。在茅盾所建造的“文学上海”中,纯粹的物理空间,由于活动于其间的人物的行为和社会属性,而被赋予一种明显的道德意义。他小说中的租界以及娱乐场所,甚至坐落在租界的资本家公馆也都含有或多或少的色情化成分,大饭店被想象为淫乱的地方,而公馆则常常是聚会、密谋的场所,这些地方总是与买办、西化的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成为展现这个阶层道德堕落的场所。如《子夜》中根据妓女似的摩登女人刘玉英的行踪路线和探险经历,展现了租界内买办的居所、西洋式的大饭店、交易所的内部空间,并将它们与外滩一带的外部空间联为一体。南京路外滩,被称为西洋美人的摩登女人与一个臂弯挂着手杖的西装男子戏剧般地相遇,大风刮起女子的旗袍,卷住了男子的手杖,旗袍被撕裂。他们开猥亵的玩笑,交流交易所信息。画面式的形象描写不仅将租界的外部空间而且也将内部空间色情化,甚至风 and 手杖都成为掀起女人旗袍的道具。在《第一阶段的故事》中,对惟利是图的资本家之堕落淫荡性格的表现也是通过其所处的空间描写完成的,他

的公馆客厅是社交场所,大亨们在这里密谈大事,轰然大笑,谈论女人,欣赏《汉宫春晓图》。法租界不像洋房也不像字号的地方,是他与其他资本家聚会的地方,资本家们在这种半妓院类的地方一边谈论股市行情、战争,一边谈论女人,金钱与性结合在一起,是他们人生的两大追求。空间的政治化与道德化由此可见一斑。租界乃至上海的色情化是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上海文学的普遍特点。不论是晚清的黑幕小说还是妓女小说,都把上海看作是道德堕落的渊藪。妓院是小说中的主体场景,也是上海空间的支配性节点,<sup>④</sup>不仅是男人性消费的地方,而且作为男人的公共空间而存在,是男人聚会、交流信息、洽谈生意的场所,兼具饭店、茶馆、赌窟的各种功能。妓女,在所有文化中,作为罪恶的象征和道德堕落的符号,也成为上海的隐喻。正如叶凯蒂所说,妓女和上海作为两个可以互换的主题,用以表现这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她的意识形态。”<sup>⑤</sup>“晚清上海租界的魅力,其繁华奢侈充满自信与活力的形象,是与上海妓女分不开的。上海妓女以其奢豪昭著的生活与经营方式,又是租界吸引外来游客的一个重点。其形象在当时是时髦的代表,其行为举止成为妇人效仿的对象。她被看成是上海精神的化身,象征着这座城市诱惑与腐蚀的力量。”<sup>⑥</sup>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文学中,妓女不再作为主导性的人物存在,而代之以摩登女人用以象征上海的精神,西洋化的娱乐场所和大街及其建筑物,取代了妓院成为主导性的空间场景,摩登女人的活动空间更为开放、西化,恋爱游戏代替了纯粹的性交易,在两性关系中,男性越来越失去了主动地位和控制能力,欲望的延宕代替了欲望的满足,男人成为摩登女人和城市的观察者,西化的空间和摩登女人交织在一起成为上海空间的支配性风景。

正如丹尼丝·伍德所说;“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sup>⑦</sup>“地图是一种社会建构”。“地图,所有的地图,势必如此地、不可避免地呈现了作者的成见、偏见和徇私(更别提较少被注意到的,制图者呈现其心血时的艺术、好奇心、优雅、焦点、细心、想象力、注意力、聪明与学识)。在描述世界时,描述者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及其他特质的限制。”<sup>⑧</sup>同样,

作家对都市空间的描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绘图行为,文学中的“城市地图”也是一种精心选择和回避的结果,作者总是有某些特别关注的地方、焦点、主题和方向,某些街道和建筑物或场景被不断重复,而某些地方则永远被排除于视野之外。在对上海的表现中,强烈地吸引中国作家的那些方面,或者被外国作家所忽视,或者被赋予完全不同的意义。正如李欧梵所说:以观光者的身份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的横光利一,集中笔力描写的是贫穷肮脏的景象,而不是生光化电的辉煌景观,“和他的中国追随者(新感觉派)所描绘的五光十色的现代都会截然不同,横光利一的上海却是黑暗、贫穷而肮脏的‘地下世界’”。<sup>⑨</sup>基西在《秘密的中国》(1933)中描写了工厂以及堆栈的原始与野蛮,小孩子们随大人在棉花的灰屑和羽毛的绒毛里面干活,负着重物的苦力们发出嗡嗡的“歌唱”,嗅着肠子和皮革的气味,人力代替了机械,成为最廉价的机械,“他的手是升降机,他的手臂是链条,他的肩是运输小车,他的腿是铁路——这些机械不需要机械师,不需要燃料”,也不需要保养。<sup>⑩</sup>这使他联想到了狄更斯的时代及他小说中伦敦的地下世界,但是,上海的伦敦商人固守着狄更斯时代的劳动状况而不想改变,20世纪的伦敦到处装备着强大升降机、起重机,直通到堆栈里的铁路和运输车,这一切在黄浦江边统统没有,而西方文明所施予的“圣经”、“阳伞”、“钢琴”、“玻璃器”、烟窟、西式赌场、公共租界、出卖色相的咖啡店女招待、裸体模特儿、按摩女、满街的色情广告、电器招牌、水手、音乐、拳斗……,在他的笔下全然没有异国情调的神秘,而是西方罪恶的体现,上海因此也成为西方藏污纳垢之所。爱狄弥勒在《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6)中,把上海比作但丁笔下的地狱,他在小说开端引但丁《地狱篇》的诗句:

踏进此地的人们啊,  
请你们且莫  
把一切抛却。<sup>⑪</sup>

小说通过对洋人生活的描述,形象地传达了上海作为西方之“罪恶逃城”的寓意。一只载着西方社会渣滓、罪犯的大船在海上漂了好几个月,它的任务是找到一个可以倾销这些罪犯的市场,然而,没有任何地方愿意接纳这些没有出生城市、没有祖国、没有护照、甚至没有姓名的无国籍的流放者,他们是强盗、恶棍、假造伪钞者、贩卖军火和贩毒者……。神秘的大船在混沌的海上漂流,无处停泊,最后,他们想到了中国上海,对他们来说,上海是一个形容不出的地方,但却是似生疏又熟悉的城市,似天堂又似地狱,因此,是最适合他们的去处。于是,这一船被西方社会驱逐的罪犯和渣滓便来到了上海,在这个世界上最自由不过的城市里继续其犯罪活动。任何一种罪行,只要犯在上海就不算犯罪,因此,每一洲的每一种罪恶都在这里落了种,开了花结了果。作者说,上海是失去国家的流放者、罪犯的归宿,不自由的自由市,国际罪犯的避难所。在爱狄弥勒的眼里,上海既是无法律、无秩序的城市,又是人性罪恶得到最自由、最大限度展现的城市。基西与爱狄弥勒表现了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中国作家笔下的上海以及道德判断有着相通之处。英国人克里斯多福·纽那本具有明显殖民主义色彩的小说《上海》(1956)则要复杂得多。小说以忧伤的笔调叙述了主人公丹东在上海漫长的生活经历和传奇故事,时间跨度从1903年到上海解放。作者浓墨重彩极尽铺陈之能事向英国人描绘了一个混乱、肮脏、贫穷、原始、野蛮、愚昧、堕落但充满机遇的城市形象。被渲染的城市环境构成了殖民英雄主人公的险恶处境,如何战胜这种险境并获得成功吸引着宗主国读者,同时也为殖民行为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根据。原始落后贫穷的上海需要白人来开发、拯救、并使之文明化、现代化。小说开端,随着主人公丹东乘坐的轮船从“波涛汹涌的大海驶进风平浪静的海湾”,上海由远而近地进入了他的视野,那是一片“比大海更加黑沉更加结实、污秽而又僵化了了的土地”。<sup>⑩</sup>丹东斜倚在船尾,凝视着浦江两岸的田野:生机盎然的稻田、泥石矮屋组成的村庄,寂静安谧,田间里男男女女人声鼎沸,脑后拖着黑色的长辫,在水田里弯

腰干活。水牛在未耕犁的田地里自由自在悠闲漫步，赤膊的孩子们发出刺耳的吆喝。包围着上海的这片土地既污秽、僵化但又充满生机。而展现在他眼前的上海则是贫穷、肮脏、丑陋不堪、令人恐惧。混乱的码头上，轮船四周云集着讨饭船，乞讨的女人和小孩邋里邋遢、赤身裸体、满身疮疤。城市里右边是一幢幢廊柱式的石建筑，左边是狭隘昏暗的小巷、矮小的房子、肮脏灰暗的贫民窟。污浊的江面上漂浮着尸体，阴沟里散发出阵阵臭气，腐烂的垃圾堆上老鼠乱窜，高耸的教堂旁边睡着弃婴。成群结队的难民、乞丐、熙熙攘攘的人群、成队的驴子从街上经过。讨价还价声、小贩的吆喝、吐痰、咀嚼声、隔街的呼叫声不绝于耳。欣喜若狂的人群在大街上围观杀人。穷人居住的地方到处是蜘蛛网、四处爬行的蜥蜴和嗡嗡叫的蚊子。在丹东看来，这里和新加坡、香港、科隆坡、马耳他一样。丹东坐着黄包车穿越上海的街道，看到的是蹲在货栈阴影里的苦力，茫然张望、默不作声、毫无生气地用棕色的竹烟杆抽着烟。衣服褴褛的黄包车夫在街上飞奔或吃力地行走。外滩在丹东和许多英国人的眼里就是沼泽，那里滋生蚊子和各种病菌，传播着疟疾、霍乱和鼠疫，威胁着殖民者的生命。上海的恐惧感又由于无从琢磨的中国人而进一步强化，在小说中，中国人是狡猾、残暴、野蛮、神秘的。丹东看到海关的中国雇员高高的颧骨、歪斜的眼睛，映出恐怖、邪恶的面目，烟囱里的浓烟又给他们增添了几分凶相，他们大声嬉笑争吵。穿着破旧的烂衣服，赤脚驼背的小个子中国人总是蹑手蹑脚，谦恭又胆怯，佝偻着身子，干瘪消瘦，他们的沉默让人感到神秘、恐惧。小说中，对中国人的恐惧感始终伴随着主人公，这不仅是对自己作为闯入者的不安以及对中国人作为陌生异己者的惧怕，而且也是对于他的同胞对中国人的野蛮侮辱将会招致报复的恐惧，如丹东的仆人阿金本是附近的农民，在一次打猎中，她的丈夫被英国人梅森的枪打中，丹东对此深感不安。后来，阿金成了他家里的仆人和管家，但丹东对她和她的家人一无所知，她的丈夫参加了共产党，儿子参加了帮会，丹东的司机也是黑帮的人，他们都参与了绑架他儿子的活动，而对中国人的恐惧又与



经济利益、与争夺女人等等联系起来,抢夺中国人的利益,娶中国人为妻,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上海》集中表现了一个殖民者面对上海时的复杂感情。丹东在英国属于那种家境窘迫的工人阶级,受报纸上招聘广告的影响,身揣10英镑,怀抱着发财的梦想只身来到上海,在这里与早已成为富豪的外国人、掌权的大班、本土的商人、买办、黑社会或合作或较量,最后,成为工部局董事。丹东不仅是成功的殖民英雄,他直接地参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和对它的管理,而且也是他所身处的上海的观察家、凝视者,小说正是通过他的视角和立场描述了上海的图景,构筑了上海的形象。与中国晚清以来表现上海的小说家所关注的空间不同,《上海》的作者及主人公对摩天大楼、教堂、西方的娱乐场所和西化的女人以及汽车没有兴趣,这些地方只是作为主人公活动的地点而存在,并被作者一笔带过,很少像中国作家那样对其进行细部描写。中国作家笔下的摩登女人变成了美丽、性感、温柔、娴淑、神秘的东方美人,与美人相遇的地点也放在了茶馆。海关大楼让刚到上海的丹东感到一丝安全,它同他家乡的市政厅没什么两样,都有一个高大的方塔楼和一只大钟,它十足的英国风格使他恢复了自信。小说中,教堂作为原有道德和信仰的象征而存在,与主人公的旧我联系在一起,丹东一开始每周参加唱诗班,后来便不再去教堂,对他来说去不去教堂意味着生活的一个根本改变,他所去的那个教堂比他家乡的教堂更加华丽,充满商业气息,作礼拜的人也都是珠光宝气的新富豪,牧师的住宅也比英国豪华。上海在改变一切,也使丹东发生根本的改变。上海提供了太多的诱惑,不仅使普通英国人堕落,甚至牧师也抵挡不住财富和物质享受的诱惑,一边传道一边做着房地产交易。丹东本是虔诚的基督徒,烟酒不沾,对爱情怀有清教徒般的信念,但是在大班们的逼迫下和上海无处不在的诱惑中,他的宗教信仰发生了动摇,最终放弃了信仰,并开始喝酒抽烟,孤独和寂寞以及车夫将他拉到妓院,后来他也吸鸦片,因为大部分中国人和他的中国妻子都吸鸦片,甚至上海的江面和街道上也散发着鸦片的香味,他对这一切都逐渐习惯,他后来在鸦片生意中发了大

财,他也并不觉得这是犯罪,只有当他回到英国时,他才感到在英国上流社会的眼里,他像罪犯,英国社会对他的排斥和道貌岸然让他感到压抑,这使他把上海当作真正的家。但教堂以及神职人员一直以各种形式不时地出现在丹东的视野,让他的内心有所触动。小说中,丹东是被作为一个英雄人物来表现的,他对中国人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心,慷慨地向那些乞丐施舍,并善待他的中国仆人,主张由中国人和外国人共同管理上海,为中国人进入工部局而努力,他拯救了一个受黑社会凌辱的中国歌女,最后因为与她的婚姻而被驱逐出工部局和上海的“小英国”。丹东不断受到他的英国同胞的排挤,个人也与他们格格不入,相反,上海接纳了他,他与中国人之间建立了一种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如同许多殖民文学一样,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系总是通过宗主国男人与土著女人的肉体关系形象地获得再现,这是一种文明与原始生命力的结合,同时又被表现为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他所拯救的歌女富有旺盛的生育力、自我奉献的牺牲精神和深沉的母爱,为了救助贫困的父母而卖淫,后来为了自己的孩子向丹东献出自己的身体,她真正了解上海这个神秘黑暗城市的秘密。与她相对的是丹东的妻子玛丽——一个根本不懂得爱的同性恋者,讨厌生育,专心于收藏那些毫无价值的瓷器,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致使其夭折,小说中所表现的英国故土的生活是循规蹈矩、毫无生气、令人压抑的,丹东离开英国和他的情人、妻子,来到上海这个虽然充满危险但富有生机的城市,并与中国女人结合,意味着对英国文明和约束以及乏味的日常生活的逃避。正是在上海,他的理想得以实现,欲望得以满足。作为英国社会的下层青年,丹东在上海完成了成为英雄的历程,实现了自我。《上海》一方面肯定了殖民者对上海的改造,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上海对殖民者的同化,在小说中,上海被潜在地看作一个“异教”城市——不信上帝、拜金主义、没有道德约束的自由享乐和欲望放纵,这些都是西方文学中被诅咒的罪恶城市的特点,一踏上这片土地,殖民英雄甚至传道者就不由自主地放弃宗教信仰以及原先的道德准则,屈从于原驻地的文化及生活方式。小说表现了

固有的宗教信仰与本地生活方式的冲突,殖民者与原驻民之间的对立、富有人道主义和民族自我批判的主人公与傲慢无礼、白人至上、野蛮对待中国人、自甘堕落、粗俗无礼的殖民者之间的斗争等等问题,这些也都是19世纪欧洲殖民文学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因此,如果把《上海》放置在19世纪以来欧洲殖民文学的叙述框架中,就会看到这部小说的叙述模式和对于上海的阐释并未超出19世纪英国及西方对于其殖民地以及异己国的想象视野,对上海的想象和描述只是西方对其他殖民地城市想象和描述的复制。正如福柯所说,殖民地的“原来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这一类型并非幻象,而是补偿性差异地点,并且我怀疑没有哪个殖民地不扮演这个角色。”<sup>⑬</sup>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在《殖民与后殖民文学》中勾勒了近两百年中英国殖民文学的大致轮廓,某些叙述元素被大多数殖民文学作品所共享,如作为文明使者的主人公的英雄传奇,财富的积累,与性感美丽的身处危境的土著女人的关系,道德败坏的殖民者官员,生活放荡的白人,白人社会内部的关系,茶点时间、俱乐部活动、娱乐,“种族之间的分水岭、跨文化接触的危险、精力旺盛的青年、欧洲技术的娴熟和行政管理的效能;殖民者的凝视”等等。<sup>⑭</sup>由于与当地居民的来往、或者“太靠近野蛮原始情欲的关系、甚或异己环境所施加的邪恶影响”而引发的道德堕落以及对堕落的焦虑,对异国环境的恐惧不安,“殖民地民族所代表的令人不安的陌生与不可思议性”,原始、野蛮、混乱无序、缺乏理智等等,这些早就是非洲大陆的意象。<sup>⑮</sup>而男主人公总是被描绘为英雄,作为进步的使者,充满男子气概,具有杰出的技术才能以及道德上的诚挚。<sup>⑯</sup>在小说的叙述结构中,这个英雄主人公还常常是殖民地的观察家、凝视者,为了征服他所处的环境,他必须了解、研究并将当地的情况分类纳入他的解释体系。不言而喻,《上海》所塑造的上海形象无疑具有其他殖民城市的相似特质,因此,与其说《上海》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史实”,<sup>⑰</sup>不如说,《上海》中的上海只不过是19世纪以来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殖民主义话语的复制品。

## 注:

- ① 吴福辉《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许道明《海派文学论》、李今《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等。
- ② 正如李天纲所言:“‘租界’是世界城市史上的一种非常特别的现象。西欧的近代城市基本上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例如新教、现代科技和产业、统一的市场制度等等)中形成的。北美、澳洲和非洲的殖民城市也是在一种文化占优势的条件下发展的。”“当时西欧和北美的许多城市都实行了开放的移民政策,都允许外籍居民自由选择入城居住。”“如果清政府一开始让外国人‘进入旧城市,任其租房买地,与中国居民混合居住’,‘就能完全避免日后‘租界’的出现。”这种局面的产生一方面由于官方的排外,另一方面也来自普通大众对于外形和习俗都迥异于己的西方人的恐惧。李天纲《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处”——上海早期租界社会析论》,见洪泽等主编《上海:通往世界之桥》(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25—226页。
- ③ 茅盾:《秋的公园》,《茅盾全集》卷1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134页。
- ④ 凯文·林奇:节点是在城市中观察者能够由此进入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点,是人们往来行程的集中焦点。它们首先是连接点、交通线路中的休息站,道路的交叉或汇聚点,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转换处,也可能只是简单的聚集点,由于是某些功能或物质特征的浓缩而显得十分重要,比如街角的集散地或是一个围合的广场。某些集中节点成为一个区域的象征。见《城市意象》,方益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6页。
- ⑤ 叶凯蒂:《妓女与城市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第23页。
- ⑥ 叶凯蒂:《上海:“世界游戏场”——晚清妓女生意经》,张仲礼主编《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空间、社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308页。
- ⑦⑧ 丹尼斯·伍德:《地图的力量》,王志弘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34页。
- ⑨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0页。
- ⑩ 基西:《秘密的中国》,周立波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
- ⑪ 爱狄弥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包玉珂编译,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第1页。
- ⑫ 克里斯多夫·纽:《上海》,唐凤楼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页。
- ⑬ 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7页。
- ⑭⑮⑯ 艾勒克·博埃默:《殖民与后殖民文学》,盛宁、韩敏中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5、95、81页。
- ⑰ 克里斯多夫·纽:《“上海”出版说明》,唐凤楼等译,学林出版社1987年。